



辰州星火

王寶純



晨州星火

(营口文史资料·9)

——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营口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6月



封面题字：王宝纯

封面设计：李恩济

辰州星火 （营口文史资料·9）

1991年6月第一版

印数 1500册

盖县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3.00元

营文内印字第174号

主 编：邱 俊 贤
副 主 编：严 玉 波
蒋 犛
门 熙 鼎（特邀）
责任编辑：许 铁 舰

EC3118

史料親三
來冊姓繼
人今蓋旨
代後及惠

張益謙



一九九一年四月

市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张益谦同志题词

辰州儿女钢筋铁骨
為國家為民族敢把
日寇牢底坐穿

胡秉元

一九九二年五月

原蓋縣人民政府縣長、原蓋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胡秉元同志題詞

借鑒歷史經驗弘揚
愛國主義精神

李聯仲題

一九九一年五月

蓋縣政協副主席李聯仲同志題詞

前 言

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以花喜露、于家麟为首的一批爱国青年，积极组织起来，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先后成立了鲁迅文学研究社，出版了《行行》、《星火》、《大地》、《辰星》等刊物，开办了秋灯书店，组织了学生读书会等等。团结了一批盖县爱国青年学生，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反满抗日思想，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的罪行，进行反满抗日斗争。他们这个组织习惯地被称为“星火”同人（或“星火社”同人），其成员最多时达五十多人。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中旬，日伪特务机关——奉天警务厅和盖县警务科，对“星火”同人进行了大逮捕，前后共逮捕“星火”同人、爱国学生及受牵连的亲友家属八十多人。在一年多的关押审讯中，有八位同人牺牲在日伪特务的酷刑之下（包括因受刑过重，出狱后不久去世的同人三名），其中的花喜露和王克范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为革命烈士。被捕的同人中有十一名被日本帝国主义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伪满奉天高等法院要对他们进行宣判的时刻，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八

月十九日，苏联红军进驻沈阳的当天，这批反满抗日的爱国青年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营救出狱了。

伪满时期盖县爱国青年的反满抗日斗争，前后经历了十个年头。他们的斗争虽然没有武装斗争那么壮烈，但他们舍身忘死，不屈不挠，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了一曲壮丽的诗篇。

本会编辑的《营口文史资料》第七辑中，曾登载“星火”同人门文东、铁汉同志关于这一事件的回忆文章。之后，其他“星火”同人及知情者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将这场爱国青年反满抗日斗争的全貌让世人所知，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辰州星火》这一专辑史料。

在本书的征集、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盖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凤奎同志、原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秉元同志、盖县政协副主席李联仲同志的关心和支持，熊岳高级中学的门熙鼎同志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们谨表诚挚的谢意。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永远的怀念·····	王丹群 (1)
我的爸爸花喜露·····	花友藩 (10)
在与花喜露相处的日子里·····	郭世魁 (16)
追忆花喜露老师·····	李吉恒 (20)
花喜露同志二三事·····	李季生 (25)
回忆舵子·····	门文东 (29)
于家麟在狱中·····	杨士绵 (37)
怀念爸爸王克范·····	王剑华 (44)
回忆良师益友王克范烈士·····	汪士硕 (53)
怀念杨伯甫·····	孙 萌 (56)
永不褪色的记忆·····	铁 汉 (64)
回忆“星火”同人的反满抗日活动·····	王夕澄 (75)
记“鲁迅文学研究社”与《星火》·····	门熙鼎 (85)
闪光的足迹·····	李昌毓 (102)
秋灯书店创办始末·····	门熙鼎 (119)
过去的回忆·····	姜静芳 (128)
难忘的岁月·····	孙 萌 (134)
少年时代的一段回忆·····	洪声钜 (143)
《大地》出刊前后·····	杨士绵 (146)
回忆《大地》·····	高玉元 (152)

记读书会和《大地》	关云车 (157)
从被捕到“特赦”	于恩惠 (160)
狱中斗争	门熙鼎 (163)
末日的宣判	门熙鼎 (177)

永远的怀念

——忆田賁同志

王丹群

1934年，田賁（即花喜露——编者注）同志从海城三师毕业后，到盖县归州村两级小学任教。他知道在日伪统治时期，当一名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启发他们热爱祖国、不当亡国奴，做一个振兴中华的中国人。但在当时，尤其是在已沦陷为殖民地的东北，这些思想又不能直接给学生说，田賁同志就利用历史课和业余时间给学生讲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要立志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当时写的《校歌》和《朝会歌》上。可惜校歌的词现已记不起来了，但朝会歌当时天天唱，至今记忆犹新：

“朝霞灿烂，一朵太阳红，光华雄浑照碧空，霁色锁川原，川原形势雄，龙蟠虎踞无穷。请看我山河，山河真光宠；请问我责任，责任真綦重。用我好身手，趁此晨光熊，砥砺磨砢，使我精力充，他日破浪趁长风，宇宙任驰骋。好友好友莫等闲，一刻千金重。”

这首歌象熊熊的火炬，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像一把钥匙，打开学生的心灵，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今天读来，仍有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鼓舞力量。

田贲同志对同学情同手足，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田贲同志给学生出作文题《论志》，文章改完，在全班会上他对好的立论正确的文章给予鼓励，并对错的指出方向。如有一个同学在文章中说他立志学好，将来好享受荣华富贵。田贲在文后批“富贵之志不足取”，他找这个同学谈心，鼓励他志向要远大，念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使这个同学深受教育，以后他参加了田贲组织的鲁迅文学研究社，成为一名爱国青年，“九三”胜利后参加了革命。

1936年，田贲在归州学校组织“鲁迅文学研究社”，和爱好文艺的学生共同研习左翼文学。当时为他所喜爱的几个学生都起了笔名，记得有赤婴（已故）、殷拳（已故）、立绯、田丹等。赤、殷、绯、丹都是他所喜爱的红色。

1937年，我离开归州两级小学，考进了初中。这时田贲除了和我们离开学校的同学保持联系外，并和他所团结的一些青年作者在归州秘密油印地下普罗文学刊物《行行》、《星火》。他经常给我写信，要我写稿，寄给我鲁迅、巴金、郭沫若、丁玲等作家的著作，还有外国名著：《战争与和平》、《钦差大臣》、《娜拉》、《死魂灵》、《母亲》等，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

1937年冬，田贲写信告诉我，我们要组织起来，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教育人们去战斗。开始我们的力量很小，就象一点火花，但是它可以越来越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们一个人燃起一把火，它会照亮一角，我们四亿五千万人每人燃起一把火，就会照亮整个中国，我们的组织叫“星火同人”吧。这是一个抗日救国的秘密组织，到1939年底已发展30余人，主要是青少年。那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

是我们青年最好的老师、朋友、战友。他不但能给我们广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是我们革命的领路人。当时大家都愿找他，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都能给你解答得那样明确，而又引导你去深思。所以那时不管跟他念过书的，或是没跟他念过书的，只要见到他都叫他“花老师”，“花老师”是大家对他的尊称。田贲在归州教书5年，因他没有阿谀奉承的媚骨，而被排挤离开归州。

1939年底到1941年冬，田贲在镶黄旗小学和熊岳一小任教。时间虽短，他却团结了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那里的郎老师、戚老师，还有姜琮璐、琮琰、存光等同志。

在这期间，为了扩大宣传，1940年初，《星火》在《营口新报》文艺副刊上公开发行了。田贲同志亲自为《星火》副刊写了发刊词，严肃申明：“《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任何人插花的。期望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夫、老妇和壮汉。”这是在辽南文坛树立了一棵左翼奇葩。是年冬，由于该报主编发现《星火》副刊内容左倾，便威胁说：“反满抗日可以，但宣传赤化不行。”以后《星火》被迫停刊。田贲同志在停刊前两期《星火》副刊上发表了杂文《吃气息》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该报主编顽固到底，最终关系破裂，田贲只好在《星火》副刊最后一期上发表了杂文《舒愤懑》痛斥了反动势力。《星火》副刊共出版20余期。《星火》虽然是短暂的，但她却在辽南的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这一时期，田贲同志在《星火》副刊上发表了小说《幽静的山谷》，在《地平线》上发表了长诗《孙二祖宗上西天》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反映了当时辽南地区农民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田赉同志的小说、诗歌、杂文、议论文等，都以其独特的战斗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941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家乡那四处飘香的田野上走着，谈着。满枝的苹果，火红的高粱，金黄的谷穗……多么迷人的秋色，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这是我们父老乡亲血汗浇灌的成果，这是我们的家。可那一道道铁丝网，却使我们不能越雷池，这一切又使我们感到那么生疏，那么仇恨。田赉说：“看看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家，已变成了异邦。难道我们等待吗？不、不能！洋人除了侵略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还要奴化我们的思想。学校派来了日本人，我要到最艰苦的斗争中去……”以后田赉写了《故乡、异邦》的诗，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就在这年冬天，田赉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这一课的深远意义，当时的学生是不知道的。

1941年冬，田赉来到沈阳参加了革命，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到沈阳后，田赉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住在大南街一段高家大院门洞的“五步室”（大小五步平方故自名五步室），冬天冷如冰，夏天热如炉，吃的是煮不烂的高粱米，有时还要饥一顿、饱一顿，每天要徒步上班。就在这样的陋室里，他除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外，还以山川草草的笔名，在《盛京时报》文学版上，发表了《向何处去》、《日本开拓文学的翻译》、《大众语与文艺》、《应声之语》、《塔·城·一切建筑》、《诗歌的发生》、《观剧书感》、《期待于今年者》等文学评论和理论文章。这些作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东北沦陷

区文学的方向，既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又以高度的写作技巧避开了敌伪的审查。

为了充实自己，以利战斗，他不知疲倦地看书学习。看马列主义书，文学书，还学日语。时间是紧张的，舍不得浪费掉一分钟。有时为了看一本书忘掉了吃饭，等想起吃饭时一看炉子熄了，米还是半生的，为了节省时间，也就吃这半生饭，他还幽默地说：“我是吃生米长大的。”

1943年夏，经组织批准，我和田贲在沈阳结婚了。婚后，我们仍住在“五步室”。那时我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住的“五步室”，吃的“自由饼”（把黑面用白水一和烙成饼），喝的“解放汤”（白水煮菜），读的马列书，做的革命事，真是乐在其中。

就是在这个“五步室”里，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欢乐忙碌的日日夜夜。这个小小的“五步室”是传播革命真理的课堂，是研究革命斗争的密室。那时，侯洛和贾玉岗同志常来这里和田贲密谈革命工作。有数不清的青年来这里聆听田贲讲革命道理。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岁月里，对寻求真理的青年来说，如同黑夜里看见了指路的明灯，周立、王清等同志就是从这里奔赴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斗争。

田贲对我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布置给我的工作很多。除了一日做两餐简单饭菜，我还要写日记，抄马列主义书（如《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每天晚上他要检查一下，我每看完一本书都要谈心得体会，有时还要写出读后感。他常对我说：“我们是为斗争而生，我做的事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劳苦大众，和我共同生活不是幸福，要有不怕艰难困苦，甚至牺牲自己的胆量，你怕吗？”我说：“不

怕，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怎么做，我怎么学，你做到的，我也要努力做到。”他高兴地说：“我相信。”

星期假日我们常到顺城街的旧书摊去，搜索在书店里不能买到而又极其宝贵的好书。如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就是在旧书摊买到的。他还领我和来找他的青年去看贫民窟、工夫市（失业者出卖劳动力的市场），观察饥寒交迫的贫民生活，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

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田赉的机警性是很高的，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在抄革命理论书籍时，都是首先把书拆成单页，有外人来，我们就把它当废纸轻轻一揉，假装扔掉，来往信件看完后立即毁掉，在日记和书信中不写任何人的名字。

1943年冬，我们离开了“五步室”，搬到小东街一段九十四号。但“五步室”我们没有舍得辞掉，由姜毅同志继续住下去，直到田赉被捕，姜毅同志离开沈阳到胶东解放区工作，这个“五步室”才人去室空。

1944年4月28日，田赉不幸被日寇逮捕，关在北陵留置场的一间刚能转开身的暗室里。夏天热得喘过不气来，冬天冻得发抖。敌人为了得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名单，对田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压杠子、皮鞭抽……。田赉在北陵留置场受审讯历时7个月之久，每次审讯都是晚7点到次日早7点，从没间断过。在审讯时田赉以不可遏止的愤怒，用大量事实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一件件铁的事实驳得敌人理屈词穷，所以每次敌人都是一无所获，只有施以酷刑。有一次敌人问田赉的朋友都是谁，田赉理直气壮地说：“这还用问，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我的朋友！”还有一次敌人看硬的